

吴毅：超越时空的定力与自信

徐 涟

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化类型，凝聚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智慧，包含着各自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的独特看法。经历了无数时间的历史考验，我们今天知道，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基于不同视角、不同境遇、不同空间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很难用高下区分。而在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打破了文化类型在不同空间的独立存在，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欧美文化、非洲文化……所有独立存在的文化类型，都被同时并置于互联网时代的同时空当中。尽管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同化与消解的可能无处不在。如何从困境中突围，去创造文化发展的灿烂明天，需要从个体到整体人群的不懈努力，需要有强大坚定的自信、力拔山兮的勇气和坚韧顽强的毅力。

吴毅成名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李可染赞曰“用墨很好”，刘海粟带他同上海创作并为他题词“画弟子吴毅画笔挥洒汪洋与古为新，为中国画坛崛起之高峰。”他于80年代初即大胆创新，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市场的中青年画家之一。随后他携夫人远赴美国，至今二三十年。在东西文化的交融浸染中，他始终坚持中国水墨的传统路径与本体特征，并向美国观众和艺术界大力推介中国艺术。他创办了非盈利的学术机构“中国现代艺术学会”，举办过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超越时空的定力与自信”，做着中国艺术“一砖一瓦”的基础工作。身处西方世界而对传统中国水墨的坚守，对当代中国水墨在世界的传播，使他成为今天一个极有意义的个案，给予我们诸多启发。

每一位艺术家的成长经历都会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人生的几次大转折，以及不惧怕变化与漂泊的性格，决定了吴毅今天的人生轨迹。吴毅籍贯广东珠海，193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1937年随父母全家到澳门。家道中落，年少的吴毅出入于当铺典当衣物，品尝到人生的不易。受孙中山爱国思想的影响，吴毅15岁考入华东军政大学，1950年调至华东海军学校信号中队受训并留校，成为中国第一代海军信号科助教，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那时吴毅的梦想是当一名远洋舰长，像岳飞、文天祥那样精忠报国。部队闲暇生活之余吴毅则继续着儿时画画兴趣。

1958年，吴毅以现役军人的身份报考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选择了国画专业。从此，他开始了艺术的攀登之路，先后得到罗叔子、陈大羽、沈涛、谢海燕等老师的指点，中国水墨画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刻苦的学习，使得吴毅在校时就赢得了“吃纸老虎”的称号。1962年，吴毅和大部分同校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到江苏省轻工设计室搞产品装潢设计。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吴毅白天挨斗，晚上画画，利用点滴时间，在方寸之地用线条笔墨施展着自己的才华。

不从众、善思考，是吴毅的习惯。不愿人云亦云，使吴毅从水墨画创作之初，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他的国画没有“文革”遗留的痕迹，却与坚守传统的国画大师有着内在的文脉相承。1979年，吴毅在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亚明的带领下，到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作画，受到前辈画家李可染、刘海粟的称赞。1980年，南京书画院成立，吴毅被聘为书画院画师。同年被选为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南京市文联委员。

此时的吴毅，已过不惑之年。从1982年起，他数次赴甘肃、青海、畅游敦煌，沿文成公主入藏路线，经日月山、青海湖到格尔木，登上昆仑顶峰，感受大山大水的雄浑壮丽。写生归来，吴毅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与他自己以往的创作不同，不再是水墨画所擅长的江南山水，而是以酣畅的笔墨，流动的气韵，描绘出苍茫大地、气象万千。

现在回头再看吴毅30多年前的创作，不难理解当时所引起的震动。画面处处流露出似乎未被“文革”割断的深厚传统和文人意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是保守，而是大胆超前。1982年第7期《美术》发表了吴毅作品专栏，其中《山高水长》作为封面，在那个媒体资源紧缺的时代，是非常特殊的规格。吴毅是超前的。他率先看到了传统中蕴含的巨大力量，并时时将宋元明清的传统作为超越的对象。放在今天，这些作品也处处流露出新意。这不是某一地某一处的风景，而是画家心中的大山大水。面对这样的作品，让人感受到的，只有包含大千世界无数沟壑的人类心灵，才能具有这样的胸襟与气度，当然，从中也能体会到画面中所包含着吴毅突破自我、突破前人的雄心与自信。

1984年，吴毅与夫人沈蓉儿访问日本，与日本艺术界来往密切。加山又造邀请他们作个人画展开幕贵宾，平山郁夫称赞吴毅“画出了西北的气势”。半年后，他们又踏上美国的土地，从此将家安在了纽约，在大洋彼岸坚守着中国水墨的创作，同时也开始了将中国水墨画推向世界求得认同与尊重的艰难之旅。



《春芽初萌图》 吴毅作

和20世纪之初远赴西方留学的前辈相同，吴毅远赴美国是因为渴望了解世界；而有所不同的，则是吴毅以一个成熟中国画家的身份来到西方，其实有着更大的抱负，即希望让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了解中国水墨艺术。他渴望着“我了解世界，世界了解我。”他曾说：“我了解了世界就明白我该做些什么，世界了解我，这个‘我’更是指大我——中国水墨文化”。

强大的传统基础与坚定的思想信念，使他经受住了西方当代形形色色艺术流派思潮的冲击，没有失掉中国水墨画传统。他潜心创作，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前人。他也不为市场所利诱，从不为市场而画画。在寂寞坚守的同时，他深深感到，对中国水墨的评估在西方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价值。他愿意做一个先驱，“因为你追求的艺术是高标准，这个目标不一定在你有限的生命里达到，但为另一群人达到，那是历史给予的机会，这也是一个生命现象，是一个更长远的生命过程。”

确实，身处30年前的美国，要想让世界认识中国水墨，认识当代中国人的艺术创造，是一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情。但吴毅的个性，决定了他从来就是一个胸怀宽阔、知难而上的人。在他的性格中有股与生俱来的倔强，又有着一股天生的骄傲。他常常逆时代潮流而动，这使得他在“文革”时期画出了别人不敢画的风格，也使得他到美国不去做艺术市场，而要做别人不做或难做、甚

至是不可能做的事情。1994年，吴毅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了非盈利性质的学术机构“中国现代艺术学会”，随后邀请中国艺术界的画家、学者赴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参观、考察、交流、讨论，探讨中国水墨画的传承与现代转型。2002年，学会在纽约举办了中国画百年回顾国际研讨会，邀请了30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学者演讲。2008年，学会与洛克菲勒三世创办的Asia Society Museum合作，在纽约举办了“中国水墨艺术美学体系国际研讨会”，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水墨画的独特性及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及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的作用。吴毅说：“世界处在大变动的非常重要的时代，是锻炼人才的时代，赋予了一代人重任——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能放弃，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有坚定的信念和追求……”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我们不难发现诸多成功的个案。赵无极、朱德群，都是从中国文化中走出去并在西方世界成名的艺术大师。在他们抽象的油画作品中，处处显露出中国的印迹与东方的神韵，但他们毕竟都是以西方人所熟悉的艺术语言进行创作，对西方人而言，他们令人入迷之处，仍在异国情调。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的熊秉明，上世纪50年代即以其雕塑作品为法国艺术界所称道，而其蕴含在抽象结构中浓浓的东方情韵，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与认可。至于其在中国书法上的造诣，在法国更少有

知音，而甫一传至国内就引起无数共鸣，被中国人奉为大师。他充满东方情思哲理的艺术评论，则成为艺术圈内的追捧，“若想活得明白些，活得美些，都应该一读这本书”（宗璞）。应当说，熊秉明的艺术价值至今仍被低估。因为，在沧桑巨变的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被西方、甚至被中国人自己低估。

自上世纪50年代后，国人留学多到俄罗斯，鲜有正常途径赴欧美留学。直至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再次涌起留学大潮，一批优秀艺术人才纷纷走出国门，游学西方。至此，西方也开始从当代艺术的视角审视巨变中的中国，借助拍卖行的推动，一批中青年艺术家登上了各大拍卖行，也成为时代瞩目的艺术明星。但其中看不到与中国传统水墨精神一脉相承的当代中国艺术，唯有真正代表当代中国人传统价值、精神追求的艺术样式。因为在已有的西方艺术格局当中，我们是被选择的对象；在他者的眼光当中，不可能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而包括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直至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仍被远远低估。

当代中国艺术真正被西方认知，依然任重道远。

三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吴毅数次回国举办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几十年坚持的水墨创作与他今天所达到的艺术高度。2009年，吴毅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大型展览，受到了国内艺术界的极大关注。2012年，吴毅再次携新老创作，在恭王府举办“易象思维——吴毅、沈蓉儿中国画作品展”，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画展研讨会，对吴毅的创作给予了很高评价。沈蓉儿，原江苏画院画家，在艺术上具有相当造诣，与吴毅几十年夫唱妇随，在艺术与生活的道路上携手并肩，一路同行。

在异国他乡近30年时间里，吴毅在艺术上孜孜以求，从不间断地创作、实践，在理论上则深潜传统哲学、美学等传统文化典籍当中，力图贯通古今，有所突破。在多次研讨会上，吴毅提出了“象思维”的概念，并不断丰富完善，意欲以此概括出中国人原性的思维模式。“东西方的差异，在于思维的差异，仍在异国情调。西方艺术的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但中国艺术的研究却缺乏大的审美体系作为参照。中国历代大画家没有看到光？不懂得在自己的绘画当中表现光？显然不是。这是由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的。只有找出我们的原创思维

对鲁迅跨世纪与跨文化的审视

——评《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

魏琛琳 李 屹

从恽铁樵点评鲁迅小说《怀旧》以来，鲁迅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鲁迅是谁？也成为跨世纪的百年追问。2013年由葛涛担任执行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10种，在鲁迅研究乃至整个文化界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首先，10本书的作者几乎都经历过“文革”一直走到今天的经过历史沉淀的著名学者，他们精选的鲁迅研究成果都是从20世纪到今天的跨世纪精品。其次，由于鲁迅作为文豪和文化巨人的产生是中国、西方与印度三种文化的结果，因而这套精选集有很多种都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鲁迅的。再次，这套精选集几乎都涉及到鲁迅的当代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鲁迅的精神奥秘。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活着鲁迅》，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是在追问鲁迅的当代价值。本书从“有意味的参照”“文体家鲁迅”“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鲁迅”“与鲁迅相遇”四个角度出发，通过将鲁迅与周作人、胡适等进行比较以及客观还原20世纪30年代传统文化几次交锋的历史，展示了鲁迅的独特性；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将文本细读与审美体验相结合，展示了作为不同文体家的鲁迅；而且通过比照作为学者、小说家、散文家、艺术家的鲁迅对问题观照和表达角度、方式的不同，让读者看到多样化的存在形式给予其更为广泛的价值。最末一章通过对鲁迅接受史的解读和梳理，阐发出鲁迅永远是“活着的鲁迅”。

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的《中国需要鲁迅》上编为关于鲁迅小说的研

究，中编是关于鲁迅作品的欣赏与分析，下编是“鲁迅与中国”，在对鲁迅的哲学思想、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展开充分论述的同时，着力发掘鲁迅的当代价值，认为中国现在仍然需要鲁迅，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鲁迅。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的《荒野过客：鲁迅精神世界探源》，将史实的考据和艺术表现的研究相结合，不仅体现在章节的划分中，还在具体的文章中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尤其是通过对《野草》的分析，着重发掘鲁迅的精神价值。因为《野草》的研究不仅展现了文本自身独特的魅力，还将文本研究放在中国现代散文诗和世界散文诗的横向和纵向中进行对比，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探究鲁迅深奥的精神世界及其对当下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的《鲁迅与现代中国》也是从书名上就能看出对鲁迅当代价值的追问。鲁迅的精神特征、鲁迅的翻译理念、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比较、鲁迅与日本的关系以及鲁迅遗风等，是本书着力研究的问题。在纵横的探寻之后，就会看到了一个更为多元化的鲁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决定论式的偏执，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鲁迅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鲁迅在被解读的同时，又被称为与作者对话与私语的对象，是作者内化了的生命和自然。是研究鲁迅，更是观照自我。

吉林大学长江学者张福贵教授的《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从鲁迅思想的文化背景，文化选择的思想结构以及鲁迅研究的历史范式与当代评价等三方面切入，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大背

景出发，结合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对鲁迅文化进行分析，对其极具现代意识的“个性意识”和“尚德”本质进行阐释。继而对其宗教观和科学观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鲁迅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化哲学理论，“拿来主义”及“世界人”主张进行介绍。为了让鲁迅继续引导我们的精神和意识，作者还在最后将鲁迅的思想与当下环境进行对接，从民族、文化、当下中国的发展，以及鲁迅研究边缘、异域文化空间的生长角度进行了梳理，试图带领读者一起逐步走向鲁迅，让我们明白：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

鲁迅是东西方文化合璧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巨匠，因而从跨文化的视角审视鲁迅就成为必然。人民大学长江学者高旭东教授的《跨文化视野中的鲁迅》，将鲁迅置身于中西文化冲突的漩涡中进行审视，对鲁迅的中西文化观、中西文化对鲁迅思想性格的塑造、鲁迅的反传统与改造国民性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选择等问题进行探讨，展现了东西文化汇流之后作为一个深刻的中国人的全部危机和复杂性。在纵横比较之后，作者发现，鲁迅非但不是神，而恰恰是东方文化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最具有颠覆性质的“文化恶魔”，并且以恶魔的力量惊醒沉睡的国人。在对国内外的非议鲁迅者进行了评述与商榷之后，本书追寻了鲁迅传统的形成及其在当代的命运。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杨义教授的《鲁迅文化血脉还原》，由“重读鲁迅小说与本国文化之关系”和“鲁迅的诸子观及其他”两部分组合而成，将研究置于本土化语境中，论述了屈原、陶潜、嵇康、

章太炎、李贺等人对鲁迅的文化影响。鲁迅在在看取西方文化的同时，以批判反省的眼光汲取传统文学的深厚滋养，从而使自身具有“外之既不屈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牢固有之血脉”的特点。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中，鲁迅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同时，这种把文化的延续性与创造性相结合的做法也是十分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和效仿的，只有先成为文化遗产的保存者，才能在将来更好的成为开拓者和建设者。

浙江大学黄健教授的《孤独者的呐喊》，从“反省与选择”“审视与批判”“探寻与创造”“影响与启示”等方面切入鲁迅研究，认为鲁迅一方面要从整体上反叛传统，一方面要在传统中进行寻根；一方面要结合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西方文化进行合理取舍，一方面又要保证卓尔不群的精神自由与超越。接下来，作者将鲁迅置于佛教文化、“大历史观”视域和知识分子身份下辩证地进行审视，对其之所以能够屹立于民族文学之林和他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对鲁迅对当时和现今文化的影响、贡献、启示作出了价值判断，认为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呐喊。

鲁迅仿佛一座开掘不尽的金矿，他的文化魅力就在这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思想的多元性与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使他的文本被一遍遍讨论，他笔下的人物、意象和词语表达被一遍遍阐释，他的意义、地位和价值被一遍遍重构，而鲁迅巨大的文化价值，正是在这种不断阐释中实现的。

观点摘编

“礼乐”是西周政治现实的艺术象征

西周政体建基于贵族阶层的血缘情感，展开为诸种对立要素的和谐，其现实的表现则为诗、礼、乐。诗是西周统治者提振民心、考察民情、团结宗族、让下层民众抒散心中怨愤的重要手段，既是艺术的，也是政治的。与此一致，周公在摄政的第六年开始规划国家的长治久安之策，重要手段就是制礼作乐。诗、礼、乐，就其本性而言，具有鲜明的艺术性。诗是建基于心灵、外化为语言表达的仪式，礼是建基于身体、追求行为雅化的艺术，乐是建基于社会秩序、追求精神超越的艺术。但是，周公制礼作乐显然不是为了艺术，而是要将艺术应用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创制。

因此，中国社会自西周始，“礼乐”往往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现实层面，它被视为赋予社会文明秩序的手段；二是在理想层面，礼乐因其艺术特性而代表着社会的文明和雅化，成为美好社会的象征。总之，诗、礼、乐与政治的紧密关联，铸成了西周时期关于艺术的基本观念，即以艺术作为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的象征或隐喻。这种政治化的艺术观也成为后世官方意识形态介入审美和艺术批评的主要原则。

摘自刘成纪《西周礼仪美学的物体系》，原载于《文艺研究》2013年第1期

儒家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

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发展了儒学，尤其是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把儒学推向了新的高度；儒家的生态思想也从早期单纯的对于动植物的怜悯，逐渐发展到完善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本性。朱熹说：“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既然人与物的形体及“性”都源自于共同的天地，所以，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本性，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但是，由于人与物的“气”的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乃至物与物之间存在着差异，因而各有不同的“道”，即人有的生存方式、物有的存在方式。在与自然万物的相处中，人处于主导地位，但必须尊重自然。朱熹说：“人为万物之灵，自是与物异，若迷其灵而昏之，则与禽兽何别？”人如果将自己视为高于万物而任意宰割万物，就会将自己等同于禽兽，而要尊重自然，就要认识自然，并按照自然规律对待自然、顺应自然。朱熹认为，对于自然万物，必须根据其不同特性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应当“全其性，遂其宜”，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达到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儒家所要达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从生态的角度看，这不是单纯的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一种通过人与自然的互补与协调而达到和谐的生态观，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摘自乐爱国《儒家生态观：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原载于2013年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